

产经文库

干春晖 主编

ZHIDU

HUANJING

YUZHONGGUO

CHANYEDE

DONGTAIBIJIAO

YOUSHI

王健 著

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 动态比较优势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产经文库

干春晖 主编

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 动态比较优势

王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王健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产经文库/干春晖主编)

ISBN 978-7-208-14020-2

I. ①制… II. ①王… III. ①产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6450 号

责任编辑 汪 娜
封面设计 夏 芳

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王 健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172,000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20-2/F·2401

定价 30.00 元

《产经文库》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促进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但这种以扩大规模为特征的外延发展方式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被动的调整状态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克服产业“瓶颈”和填补产业“空白”,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提高产业效益,但“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困境没有根本解决。长期以来,靠低成本制造及出口、大规模开发与建设、排浪式消费等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不断扩大,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无法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升级之后的需求结构相匹配,部分行业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表现为一方面某些领域巨大的内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说,供需之间在结构上严重不匹配,这种资源的错配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效率。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进入到6%—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而且,还有继续向下的压力,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内在结构的变动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为了使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持续增长,新的增长动力必须向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为主转换。

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的现状,实现增长动力多元化、均衡化的目标,深入发掘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将新改革与经济转型进行耦合,从而建立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地位。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以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应该从世界经济强国和大国地位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这需要在全面深化内部改革的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在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非典型”增长阶段,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制度障碍不断凸显,呈现出了“最典型”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迫切需要在这种“非典型”增长阶段、“最典型”转型升级下,成功地跨越“转型陷阱”,为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在通过打造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转型;在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调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积极突破制约高级化的约束条件;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上,重点要实现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同时加快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产业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在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通过消费需求升级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重点要设计提高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机制,同时要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上,重点以领导型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化市场为载体构筑有竞争力的国家价值链,同时通过海外合作与收购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对接融合。

产业经济学科在上海财经大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厚实的发展基础,该学科前身为工业经济学,始于上海财经大学“文革”后的复校之初。该学科在中国产业经济学泰斗杨公朴教授的带领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奠定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之后,产业经济学科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及政策两个大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和团队成员主要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并重点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三年前,我们以上海市和财政部的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学科支撑,整合校内外的研究团队、决策咨询专家,与企业和政府部门紧密协作,在上海市教委与上海财经大学的支持下,以原来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培育的产业经济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秉持“国家急需、创新发展”的理念,对接新改革、新开放背景下国家和上海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中的重大问题与战略性问题,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研究院追踪国际产业经济学前沿发展趋势,拓展产业经济学学科研究领域,研究解决改革中的产业经济新问题,特别是从战略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先后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研究基金课题和政府委托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课题,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波动关系”、“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近年来,在国际 SSCI、国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一系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优秀成果奖项,并为国家和上海等地方政府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分别获得国家 and 地方领导人的好评,起到了很好的决策咨询作用。为了使这些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出版,贡献于国家与上海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我们选择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出版。

我们想借此契机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选择团队成员近期的部分理论研究成果,以《产经文库》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近期计划推出两批,第一批以学术著作和理论研究论文为主,第二批以项目研究报告为主。除了不久前已先行出版的《居民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王宇博士著)之外,第一批拟出版 5 部,包括《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结构、制度与战略》、《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电子商务产业链治理及升级路径》。其中第一部是团队成员近年来相关经济转型升级主题研究的工作论文集,这些论文都已相续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第二部著作基于郑若谷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三部著作由王健博士撰写,内容是从制度环境维度研究中国产业如何构建新一轮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第四部著作由李津津博士撰写,讨论了在自贸试验区实行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及其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价值;第五部由正在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的王法涛撰写,讨论了电商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和升级路径。

干春晖

2016 年 6 月

目 录

《产经文库》总序	1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一节 制度改革与比较优势的转换	3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述	6
第二章 制度与动态比较优势的相关研究	10
第一节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10
第二节 制度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12
第三节 制度影响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理论	16
第三章 我国制度与比较优势的演进历程	19
第一节 中国整体的制度环境	19
第二节 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	26
第三节 中国各产业比较优势的演变及现状	34
第四节 制度与产业比较优势——历史分析	38
第四章 制度环境影响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机理	47
第一节 文献回顾	47
第二节 理论框架	49
第三节 制度密集度的行业异质性	52

第四节 小结与评论	57
第五章 正式制度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58
第一节 制度、技术密集度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58
第二节 制度、资本密集度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69
第三节 制度、契约密集度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73
第四节 制度、产品复杂度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82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89
第六章 非正式制度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93
第一节 政企关系、产品复杂度与企业出口	93
第二节 诚信环境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99
第三节 行业协会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	106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111
第七章 案例分析	113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法》与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	113
第二节 《诉讼费交纳办法》与产业的比较优势	117
第三节 信用环境与金融发展——以电子商务为例	122
第四节 结论与启示	125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127
第一节 本书主要结论	127
第二节 政策建议	130
附录	133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59

序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从动态的视角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将会发生怎样的转换?哪些产业可以接棒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简单来说,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正是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不断验证的。但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主要讨论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要素,缺乏对制度这一特定要素的分析,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也意味着,制度作为一种特定的要素,完全可以纳入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框架,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

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各种制度扭曲仍然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济制度的改革将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背景。

因此,在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按照要素禀赋论的分析框架,对制度依赖度比较高的行业也将逐步地建立起比较优势。从动态的视角上看,研究制度与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

比较优势的转换趋势,从产业层面明晰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这一分析不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也具有实践的可行性。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哪些产业是对制度依赖度比较高的,我们需要怎样去识别这些产业?为什么这些产业的制度依赖度比较高,也即具有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怎么样推进制度改革,并对所甄别的具有制度上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实行怎样的扶持政策?这些正是本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制度改革与比较优势的转换

一、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由 1978 年的 3 645.2 亿元提高到了 2013 年的 568 845.2 亿元,增长了 155 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由 1978 年的 381 元提高到了 2013 年的 41 908 元,增长了 109 倍。^①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传统要素的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已经难以持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我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图 1.1 显示,1995 年至 2012 年间,以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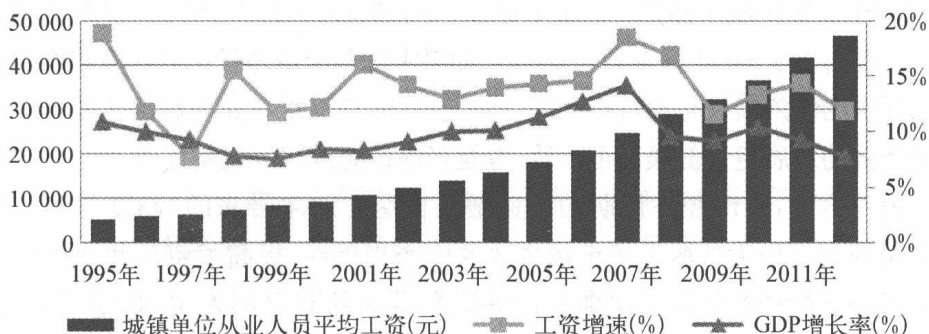


图 1.1 1995—2012 年中国劳动力价格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① 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衡量的劳动力价格已由 1995 年的 5 348 元上升到了 2012 年的 46 769 元。除 1997 年外,历年的劳动力价格的增速均在 10% 以上,并且,劳动力价格的增长速度也高于 GDP 的增长率,表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此外,我国的土地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也在持续上升。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我国综合用地(包括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价格由 2001 年的 1 033 元/平方米上涨到了 2012 年的 3 129 元/平方米,12 年间上涨了两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1996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的物流总成本由 14 993 亿元提高到了 94 000 亿元。在此期间,中国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重也高达 20% 左右,大约是同期美国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的两倍。上述资料说明,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丧失,凭借廉价的传统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无法持续,我们有必要积极推进比较优势的转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二,传统的依赖低成本优势的发展战略尽管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也带来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导致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经济活动的附加价值偏低(干春晖、余典范,2013)。此外,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过度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贸易方式会带来一系列的贸易争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数据,2012 年全球的反倾销案件数共计 208 起,其中,中国遭遇到的反倾销案件数达到 60 起,占全球的 29%。因此,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给我国带来了诸多的贸易摩擦,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再者,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是以资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为代价的,导致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据统计,2009 年,中国的环境退化成本高达 9 701.1 亿元,生态破坏的经济价值为 4 215.1 亿元,两者合计占到了 GDP 总量的 4.09%。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那么我国真实的经济增长是要打折扣的。综上所述,积极培育新一轮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为健康和可持续,也是当前极为迫切的现实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也源于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诺斯和阿齐默鲁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制度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虽然已经经历了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中国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各种制度扭曲仍然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必须全面和深化改革。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此

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还设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将2014年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制度的改革将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重大现实背景。

二、制度改革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换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及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以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重大现实背景。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仍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以动态的眼光审视比较优势的转换,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有效识别和积极扶持,将其打造成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结合上述阶段性特征,研究制度对于中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于我们积极培育新一轮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而经济增长本身也是一个要素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动态的转换。在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一国经济不断增长,比较优势也在发生动态的转换,也就是说,制度与比较优势的转换之间存在着直觉上的相关性。那么,制度与比较优势之间是否以及存在着什么样的理论关系,两者之间的理论桥梁是什么。对中国来说,哪些方面的制度改革对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在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哪些产业会成为我国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为了促进产业比较优势的积极转换,我们应该如何完善制度环境或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这些问题都有待于理论和实证的检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厘清上述涉及制度与比较优势之间关系的问题正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所在。此外,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比较优势还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为我们结合中国现实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书拟从理论上对制度环境与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之

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上,本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当前的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关系的文献是比较零散的,缺乏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本书则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借助一个拓展的要素禀赋论的模型,构建制度与比较优势之间的理论联系,可以为我国的制度改革和比较优势的积极转换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2)现有的研究制度与产业比较优势的关系的文献主要是关注正式制度对于产业比较优势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已经比较完善,正式制度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如社会文化、习俗等都对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本书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制度与比较优势的关系,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研究。(3)本书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基于制度与比较优势的理论联系,从制度环境和行业制度密集度交互作用的视角,解释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这为我们理解产业比较优势的演变路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在实践上,本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制度改革和培育新一轮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现实背景,从制度视角勾勒出产业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有助于我们把握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中国经济新的比较优势所在。(2)选取多个方面的制度指标,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还包括非正式制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明确,从培育新一轮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哪些领域的制度改革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推行制度改革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3)结合中国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制度环境改善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类型及具体产业,这为我们构建新一轮比较优势提供可供选择的的目标产业,并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指导。(4)对一些具体的改革事件及其对产业的影响进行评价,可以使我们总结得失、吸取经验,为有关部门制定改革的方式、方法以及具体产业的扶持政策提供借鉴。

第二节 相关概念阐述

一、制度环境

(一)制度的内涵及功能

在旧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制度是一种自发演化的习俗、惯例。凡勃伦就认

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①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一种行为规范。舒尔茨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一定义也被之后的经济学家广为接受，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也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②可以看出，在舒尔茨对制度的理解中，制度可以是外生的，而诺斯的理解则更倾向于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具有内生性。由于本书主要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对制度进行研究，我们对制度的理解与诺斯相似，即把制度视为一套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并且，这种规则的设定具有内生性。

对于制度的功能，不同的学者给出了多个维度的解释。制度具有激励功能，德姆塞茨认为，“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诺斯(2008)也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交换的激励”。制度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③(诺斯，2008)。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认为制度具有减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的功能。此外，制度还具有信息功能，肖特认为制度“是一种为经济当事人提供大量信息的有效信息装置”。巴泽尔则将制度视为一种公共知识。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制度的功能，但是制度最本质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康芒斯认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交易，交易构成经济制度的实际运转。在这个意义上，交易费用就是制度运行的成本(Arrow, 1969; 张五常, 1999, 2000)。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都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因而，上述各方面的制度功能都最终落脚于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二)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1993)指出，制度基本上由三个基本部分

① [美]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分析》，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9—140 页。

② [美]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美]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按照诺斯(2008)的阐述，“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也就是说，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以正式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包括宪法、普通法，政策和组织章程以及正式契约等，组成了社会的规则体系，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非正式规则包括“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等(1993)，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一些观念、习惯和行为规则。

正式的规则如法律与产权为生活和经济提供了秩序，但在经济生活中，非正式的约束也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诺斯，2008)。在诺斯看来，正式规则是非正式约束的基础，而非正式约束则是正式规则的延伸和修正，并会影响正式规则的效果。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也可能修改或替代非正式约束(诺斯，2008)。在名称的使用上，正式规则也可以被称为正式制度，而非正式规则可以被称为非正式制度。由于本书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个研究视角，为了行文的方便，我统一使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这样的称谓。

诺斯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约束个体选择的行为准则，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既可以是互补的，又可以是替代性的。尼(Nee, 1989)、诺斯(North, 1991)、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0)、万克(Wank, 2002)等针对西欧国家或中国的研究，表明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替代性的关系；而赫姆基和列维茨基(Helmke & Levitsky, 2004)则认为，非正式制度并不必然替代正式制度，也可以对后者形成补充或适应，具体情况取决于后者的影响力。因此，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或者替代性关系，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

二、动态比较优势

(一)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简单来讲，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那么，该国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就具有比较优势。李嘉图在模型中，仅考虑了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因而，比较优势就来自各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相对差异。而赫克歇尔和俄林则放宽了李嘉图的单要素假定，考虑了多种要素情形下的

比较优势。他们将各国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认为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导致了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进而影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

之后的新贸易理论学者,如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法尔维(Falvey,1981)、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 & Krugman,1983)等人则从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等角度解释了新的贸易现象。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则以专业化分工来解释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发展,仅仅是拓宽了影响比较优势的因素,不仅仅限于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还考虑了技术、规模经济和分工等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比较优势仍是由各国在某种产品上的相对成本或效率所决定的,只不过这种成本和效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影响要素。

(二) 动态比较优势

与比较优势相比,动态比较优势仅仅是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差异,在理论内核上与前者并无区别。筱原三代平(1955)、巴拉萨(Balassa,1977)以及弗农(Vernon,1966)从要素结构变化的角度考察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罗默(Romer,1986)以及克鲁格曼(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则分别从干中学以及技术外溢的视角分析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杨小凯(2002)进一步引入了基于分工演进的内生比较优势。对动态比较优势的确切定义是雷丁(Redding,1999)提出的,他将动态比较优势定义为:如果一国在某时期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增长率较低,则该时期该国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就具有动态比较优势。无论是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还是其定义,无非是在比较优势的理论 and 定义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而已。如果我们承认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那么,比较优势会发生动态演变就是一个自然的结论。本书选取的研究视角,是分析制度环境演变的过程中产业的比较优势如何变化,这本身已经包含动态的含义。因此,如果我们在一个动态的条件下使用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它其实已经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含义。